

## 第五章 結論

俄羅斯與阿根廷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改革後，不論是國內的政治或經濟環境都出現了巨大的改變。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在轉型前具有許多的共通點，例如天然資源豐富、由威權政體進行轉型、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政府高度干預國內經濟市場、市場壟斷嚴重和沉重的外債負擔等；再加上兩國都是在「華盛頓共識」下開始進行轉型，而轉型過程中所遇到的阻礙與最後經濟危機的爆發，都有著許多不謀而合之處，因而促成了本文的研究動機。透過兩個國家經濟改革的探討，筆者試圖解釋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影響其穩定化表現的原因及所產生的後果。本文將穩定化視為經濟改革的主要變項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若是無法配合執行有效的穩定化政策，國內的通貨膨脹便會不斷高升，而過高的通貨膨脹將導致總體經濟表現下降，經改社會成本不斷擴大使最後經濟改革中輟，無法持續。此外，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西方外援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西方國家檢視轉型國家經濟改革的成效又大多以國家通貨膨脹的指數及其他總體經濟指標為主，因此總體經濟表現又將影響到西方外援的態度。而這樣的因果關係，構成了本文的研究架構。在本文中，筆者以為國家政府、國會、及西方國際金融組織構成了影響國家穩定化執行的三個主要行為者。而通貨膨脹和西方外援則是穩定化所延伸出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又會再次回歸影響到國家的權力均衡，而牽動穩定化的施行。因此，筆者希望藉由這本論文能夠將兩個不同國家之經濟轉型過程，放在權力均衡的分析框架下，進行普遍性的分析與比較。

在第二章我們對蘇聯與阿根廷，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軍政府威權國家的政治及經濟背景做出探討。在分析其背景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蘇聯及阿根廷在國內經濟環境不斷惡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的情況下，迫使政府必須做出改革。但蘇聯時期的經濟改革，在背負著沉重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型態的教條下，無論是赫魯雪夫、布理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都無法大刀闊斧的進行，因此所有的改革只是在基本的框架下做出調整，無大幅度的變動，故改革結果也就成效不彰。而戈巴契夫的改革則不斷的在經濟與政治間游離，政策上的反反覆覆，為經濟改革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而且，實際上戈巴契夫的經改也並未涉及結構性的改革，僅及於初級市場化的採用。

反觀阿根廷的經濟，在軍政府七年的威權執政下，雖然試圖引進市場機制，但卻又不願放手對國家主要總體經濟指標的控制，任由市場發揮其供需機制，因此過度的干預，進口的鼓勵，赤字不斷的高升，又無法有效緊縮財政，只好不斷向外舉債；使這七年內，國家的外債增加了三倍。再加上福克蘭群島戰爭，更加深了國家財務的危機與日後經濟改革的負擔。由此可見，無論是社會主義或軍政府威權的國家，僵化的體制都使官僚腐敗、社會動盪、經濟停滯，而最後成為阻礙國家改革，進步與發展的絆腳石。

在第二章與第三章的討論中，我們也發現，戈巴契夫與阿芳辛在民主政治的運用上似乎有著頗為相似的共通點。因為對於一個新的政權來說，剛上任的領導人都急於鞏固其權力中心。戈巴契夫用「公開性」，來剔除政敵及阻力；而阿芳辛則利用民主來打擊軍方和工會，以便鞏固自己的政權。但他們兩人在把所有精力耗費在政治上時，卻忽視了已經無法再繼續延緩的經濟問題，因此不但無法打擊政敵，還造成社會對立和民眾的不滿。「民主」到最後都成為他們政治生涯中的絆腳石，不但使經濟改革政策在不同壓力下不斷被扭曲、無法貫徹，也導致最後政權的喪失。由此可見，不論戈巴契夫或阿芳辛，都無法有效駕馭民主，反而玩火自焚；再加上對改革的政策沒有明確的規範，所以皆無法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而不夠強勢的作風，也讓政策出現搖擺不定的現象，所以無法有效解決任何的問題。

雖說戈巴契夫打擊政要的手段與阿芳辛頗為相似，但阿芳辛的經濟改革與其在政治上所遇到的制肘就與葉爾欽出現了更多的共通點。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無論是葉爾欽或是阿芳辛，都需要西方國家提供相關的經改知識和金援，所以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就以貸款為條件，要求俄羅斯與阿根廷按照其經改藍圖，以最快的速度向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邁進，完成經濟改革；但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都是在民主政體下進行經濟轉型的，而經濟體制的變動，自然會對人民帶來影響，因此人民所承受的陣痛就會經由國會反映出來。所以，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就不斷的受到來自國會反對派的壓力。在葉爾欽方面，無論是 1990 年的人民代表大會或 1994 年和 1996 年的杜馬國會，都是由反對派佔有國會多數的席次，因此不但頻頻杯葛政府的經改政策，也幾次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和對葉爾欽的彈劾案。而就阿芳辛方面，其所屬的政黨在 1983 年、1985 年和 1987 年的國會中都一直處於不過半的狀態，再加上阿芳辛及其班底，本身作風也不夠強硬，黨內部又不夠團結，因此在經改的施政上顯得更加困難重重。一樣都夾雜在國會與國際金融組織間的交叉壓力下的俄羅斯政府與阿根廷政府，在不斷的受到兩股壓力的拉扯，經濟轉型的政策自然

會出現左右搖擺的現象，使政策無法貫穿，因此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就遲遲無法顯現。

透過圖 5-1 和圖 5-2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不論是俄羅斯或阿根廷政府都受到來自國會和國際金融組織雙方的壓力。國會為了反映民意，因此透過立法制衡行政，要求緩和國內經濟改革的速度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在阿根廷方面還外加了一個工會的因素，因為阿根廷向來就有一個龐大的工會組織，因此每當經改陣痛過大時，工會組織便會舉行大規模的罷工，迫使政府讓步。而在西方國際金融機構方面，則是透過貸款來控制政府的經改和總體經濟政策，而且還隨時進行監看與要求政府提出國內經濟表現的相關報告。就在這種雙重交叉壓力之下，政府進行其經濟改革和推動總體經濟政策；但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執政黨都受到選舉週期的影響，因此每當接近國會選舉時(在俄羅斯葉爾欽的例子還包括一次總統選舉)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政府又會再次轉向採用擴張性的總體經濟政策。雖說如此，但一旦國內選舉完後，西方又會再次以提供貸款為條件要求政府回到經改的道路。在這樣的狀況下，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改革自然不斷的左右擺盪，而無法持續。筆者透過政策曲線向左或向右移動來表示上述的現象，當經濟政策走向保守，曲線則向左移動，而當經濟政策走向改革，曲線則向右移動，來顯示這樣的情況。

而在觀察俄羅斯葉爾欽時期與阿根廷阿芳辛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擺盪後，我們可以發現，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政策曲線不但擺盪頻繁而且幅度巨大，因此兩國的經濟轉型可說是相當的不穩定。但阿根廷經改政策擺盪的次數顯然比俄羅斯多更多，因為阿根廷除了受到來自工會的力量將其經改向左拉扯之外，還因為國會的選舉制度，每二年改選半數國會議員的制度，讓阿根廷每二年就必須面臨一次國會選舉的壓力；不但縮短了經濟改革的選間期，也降低了政策的穩定性。所以，阿芳辛經濟改革過程中的表現與結果相對葉爾欽都顯得較差也是理所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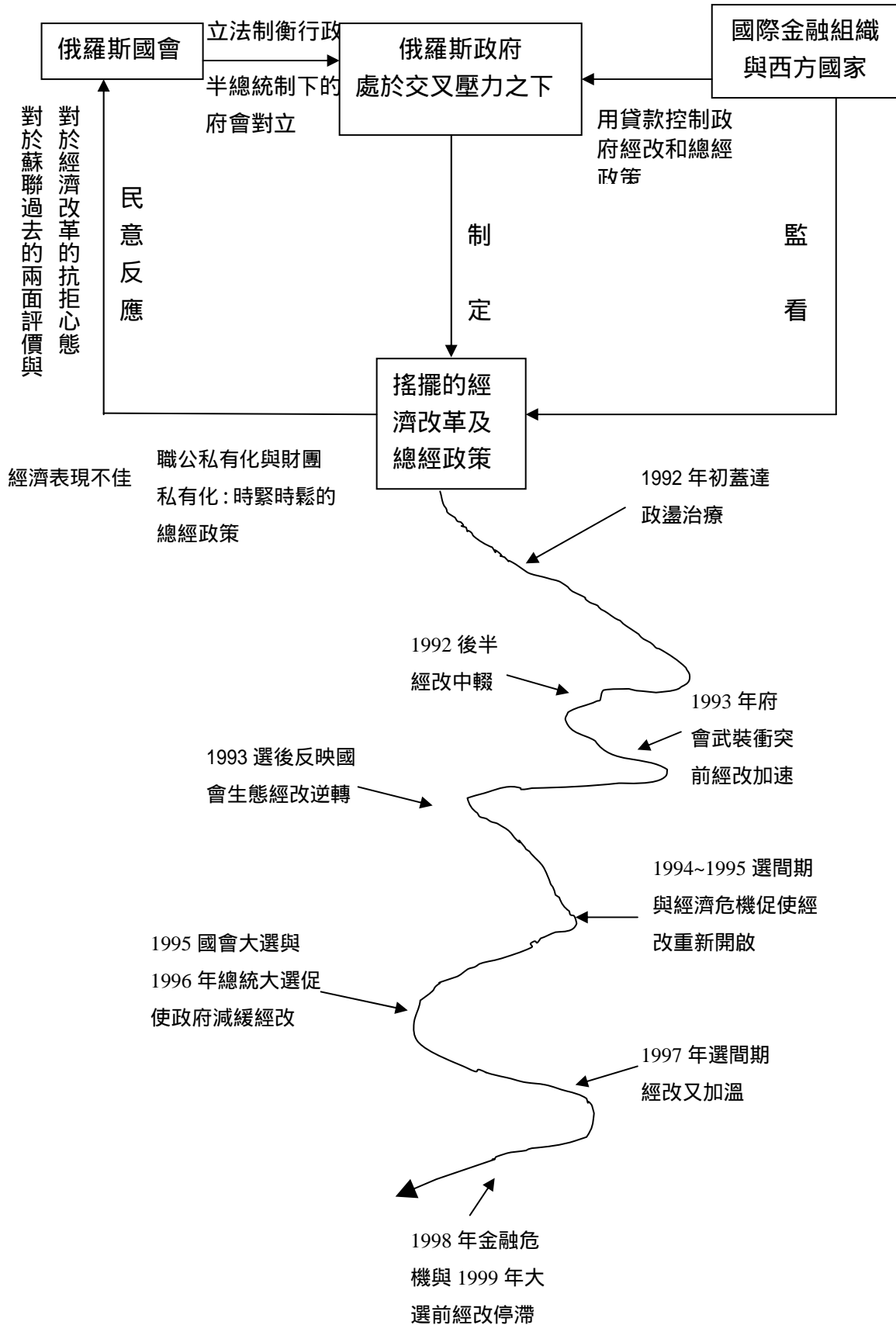


圖 5-1 俄羅斯葉爾欽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的擺盪

資料來源：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頁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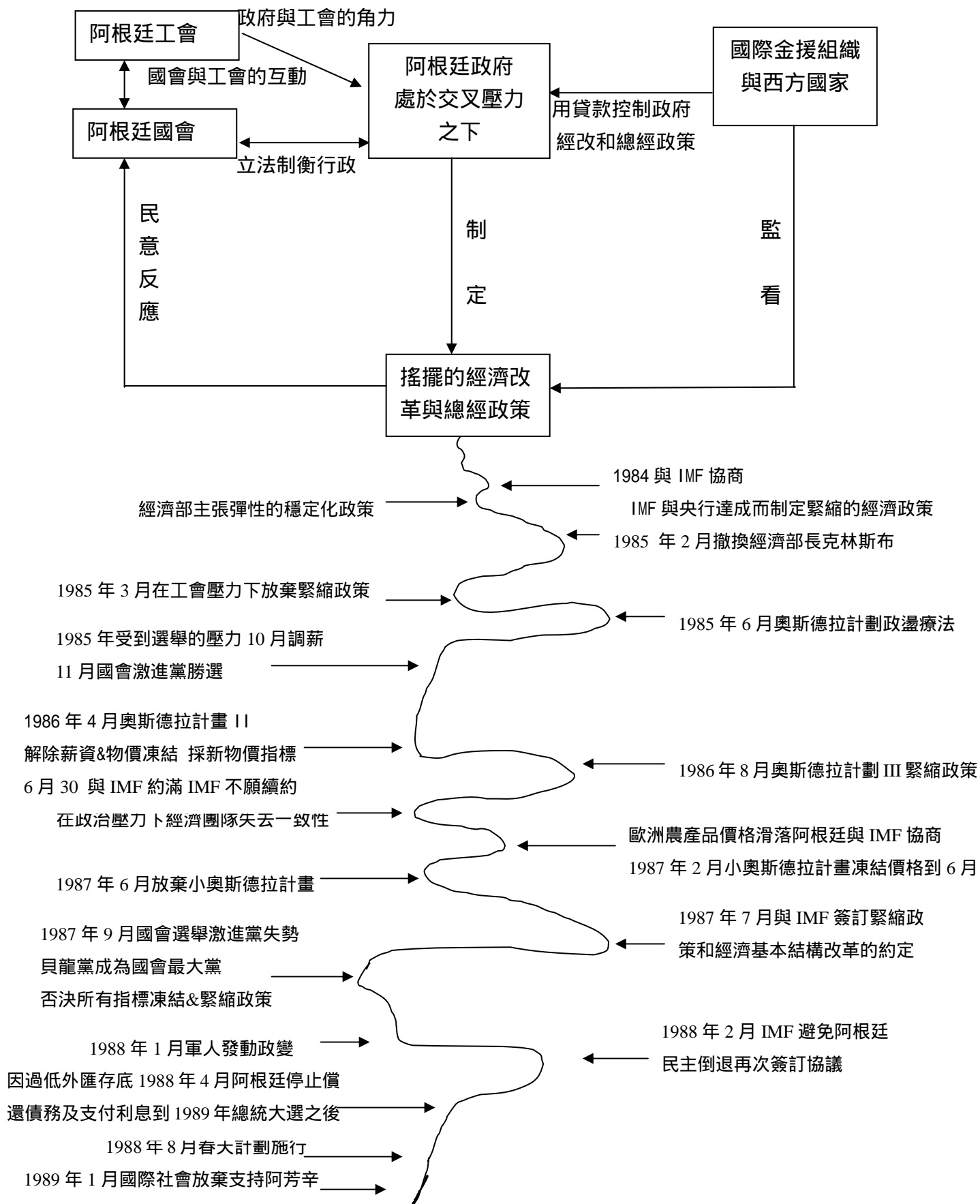


圖 5-2 阿根廷阿芳辛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的擺盪

在經由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國家政府和國會三邊之間互動關係的分析架構下發現，三個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分配會對國內的經濟改革表現帶來很大的影響(參見表 5-1)。因為無論是俄羅斯或是阿根廷，其國內的經濟改革皆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開始向穩定化的大方向移動；因此，政府是否為強勢政府，能夠有效領導國家經改政策的穩定性，或為弱勢政府，不斷受到國會及西方的拉扯，使政策搖擺不定，便對國內經濟改革的成果帶來很大的影響。在上述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改革中，其政府都是屬於弱勢的政府，因此面對國會和國際力量都較強的情況下，經濟受到左右的可能性就相對增強了許多，而影響了經濟改革的表現。因此，可驗證強勢的政府顯然對經濟改革的穩定較為有利，因為強勢的政府將會排除國會及西方國家的影響，使擁有高度的經濟理性，維持經改政策的穩定，引導良好的經濟表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但我們也可以發現，俄羅斯在普欽的執政下，經濟政策的波動也較小，而經濟理性也較高，因為在國會方面，普欽擁有多數的支持，等於國會是處於弱勢的狀態。而在西方國際方面，普欽不但提出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將不再搬照西方課本上的經改模式，而是依照本國國情重新出發的主張，還積極償還外債，對外宣布將不再向西方借款；因此西方對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影響力自然也就降低。而阿根廷方面，繼阿芳辛後的總統，美能，情況就較普欽稍稍不同，在 1989 年、1991 年、1993 年、1995 年和 1997 年國會選舉當中，執政黨在國會的席次雖然都未過半，但都一直是國會的第一大黨，再加上其任期間的經濟表現佳，使其經改並未受到太多來自國會的壓力，所以當時的阿根廷國會可說是弱勢的國會。而西方金融組織在美能的經濟改革中就佔有相當強勢的地位，因為受到美能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再加上經改知識及貸款的需求，美能對西方可說是

表 5-1 轉型經濟的三邊權力均衡

		權力均衡			經濟理性	經濟政策的 波動程度	經濟表現
		國會	政府	國際(西方)			
俄羅斯	葉爾欽	強	弱	強	低	大	差
	普欽	弱	強	弱	高	小	佳
阿根廷	阿芳辛	強	弱	強	低	大	差
	美能	弱	強	強	高	小	佳
	德拉魯阿	強	弱	強	低	大	差

言聽計從。雖說西方是屬強勢，但由於美能基本的改革理念與西方國家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所以可說是相互增強，因此經濟政策的波動也就相對較小，經濟表現自然較為佳。到了德拉魯阿執政時，情況就較為不樂觀。雖然其所屬政黨在 1999 年的國會選舉中也順利成為國會最大黨，但由於聯盟黨本身是由原激進黨和跳脫出貝龍黨的反派份子所組成，因此當主要敵人被打敗後(指總統大選)，黨內部自然開始產生分裂的狀態，而無法有效發揮黨在國會中的功能，使國會又再次落入佔有 1/3 國會席次的貝龍黨手中，而形成強勢的國會。而在國際金融機構方面，由於美能留下了龐大的外債和競選期間開出持續美能 1 披索對 1 美元的匯率政策，使國內財政赤字的問題顯得相當棘手，因此西方的貸款對德拉魯阿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在德拉魯阿執政期間，國際金融組織對阿根廷的權力比起美能時期就變的更加強大。在強勢國會，強勢西方和弱勢政府的情況下，經濟理性自然就低，而經濟政策的波動也自然變大，經濟表現也就無法良好。

在第三章當中，我們討論了權力均衡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轉型穩定化政策的施行和國內的經濟表現後，在第四章，筆者也提出兩個對轉型國家穩定化施行具有極深影響力的因素：通貨膨脹和西方外援，做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但在這裡我們必須先釐清，本文對私有化的進程並無較多的琢磨是因為，雖然結構性的改革在一個國家進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且也會牽動穩定化的執行，進而影響通貨膨脹的表現，但實際上，若國家能有效緊縮財務和信貸，國內的通貨膨脹和政府經常帳的赤字便都能得到改善。因此，國家穩定化的施行，在配合控制經濟總合與特殊的干預，依舊能為經改帶來若干成效的。所以，筆者以為穩定化對一個國家經濟改革的成效，比結構性的改革似乎顯得更具有影響力。

在第四章的討論中發現由於西方國際金融組織通常以轉型國家的經濟總體表現做為檢視經濟改革成效的指標，而國家經濟表現要好，又需先將通貨膨脹壓制下來，所以我們得到下面這樣的結論：穩定化的施行不但會影響到國內通貨膨脹的表現，而通貨膨脹的表現又會帶動國內經濟的成長與否，進而影響西方外援對其金援的多寡，而金援的多寡又會回歸影響到權力均衡，而左右穩定化的執行，因此這五者之間可說是不斷的相互影響著(參照圖 5-3)。當然，這樣的循環可以是惡性的，也可以是良性的。因此國家在進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都必須不斷的努力壓制通貨膨脹，使提升國內經濟表現，讓西方的外援能源源不絕。但若是，國內通貨膨脹的幅度過高，除了阻礙了國內經濟的成長，同時西方國際金融組織也可能減少或停止放款，或是提出更嚴厲的緊縮計畫以降低轉型國家的通貨膨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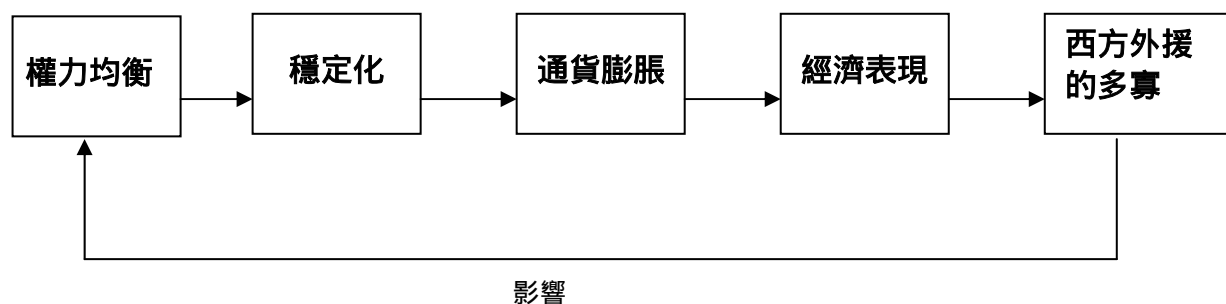


圖 5-3 穩定化、通貨膨脹與西方外援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初期(葉爾欽施行外匯走廊前和阿芳辛時期)，經改的過程中都因為穩定化的政策無法有效持續，不斷的在緊縮和寬鬆的經濟政策之間擺盪，使國內的通貨膨脹無法得到穩定，總體經濟表現自然無法改善，而西方的外援也就口惠多於實質的撥給。葉爾欽和阿芳辛在外援不足，赤字又不斷高升的情況下，只好透過寬鬆的貨幣政策讓國內的經濟得到暫時的紓解，然而，一旦放鬆銀根，國內的通貨膨脹又應聲而起，所以俄羅斯與阿根廷當時的經濟改革就一直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不斷的打轉著。俄羅斯的經改到了1995年7月時，因為葉爾欽宣布外匯走廊的施行，國內的通貨膨脹就得到有效的控制。而反觀阿根廷的美能，在匯率政策的施行下，通貨膨脹也得到有效的控制。但不同的是，由於俄羅斯國內政治環境的惡鬥，影響了穩定化政策的執行，使經改無法貫徹，而國際的金援自然就不願撥給；而在美能方面，由於國內支持其經改政策，再加上通貨膨脹得到有效的控制，經濟表現也就得到改善，西方的外援和外資也就紛紛湧入，進入一種良性的循環。但由於阿根廷的匯率政策並無考量到阿根廷國內的國情所需，只是一昧的奉行西方的新自由主義，透過經濟供給面促進經濟成長，因此一旦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在過度依賴外資，又無著重結構面和本土產業的發展下，匯率計畫的弊端就開始顯露出來。經濟衰退，外資和外援自然採保守的態度，而在無資金持續進入市場的同時，國內經濟就無法再維持成長及穩定，最後導致2001年的國家危機。但在1998年俄羅斯金融風暴和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爆發後，阿根廷和俄羅斯社會開始有了不同的省思，普欽公開表示不再向西方貸款，而阿根廷國會和民眾也反對政府再向西方借款，因為他們都認知到，不斷的向國際借款雖然可以讓國內經濟得到暫時的舒緩，但不斷增長的外債也為國內之後的經濟發展埋下了莫大的危機。



## 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驗

從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轉型的經驗中，我們將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成效不佳的原因歸咎於制度性的因素，因為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的轉型經驗中，由於兩者均缺乏健全的改革制度導致葉爾欽、阿芳辛甚至後來的德拉魯阿政府都是在國際和國內交叉壓力之下，使其經濟改革與總體經濟政策無法穩定與理性的推行，影響了其經濟表現。另一方面，國內政治環境的穩定，有助於經濟政策的穩定。在弱勢國會，強勢政府的帶領下有助於國內經改政策執行的穩定性。而穩定的經濟便會帶動生產的誘因，達到供需平衡、物價歸位，使通貨膨脹得到降溫。但顯然在葉爾欽、阿芳辛與德拉魯阿的執政下，都未能造就強而有力的政府，使國內經濟無法達到穩定的狀態，造就良好的經濟表現。而美能的經濟改革，雖然擁有國會及西方的支持，得以有效推動穩定的經濟改革政策，但由於政策的設計，並未從阿根廷的國情為出發點，找出適合與足以滿足阿根廷經濟需求的經改政策，使制度的結構不符合阿廷現實，一旦外資不再支持，維繫匯率政策的穩定便變得相當困難。可是美能在種種因素的考量下又未能適時的棄守匯率政策，讓改善阿根廷經濟的優勢逐漸耗盡，剩下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的經濟假相。而在進行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俄羅斯和阿根廷對改造所有制的知識都不足夠，使得私有化不但未對國家帶來合理的收入，還讓收益較好的國營企業也被低價出售到私人手裡，造成政府長期收入不足、預算赤字龐大，最後政府只好緊縮政策，節約開支和依賴向外借貸來彌補赤字的不足。但在緊縮政策的施行下，企業無法得到銀行的貸款維持營運，而紛紛倒閉，使國家更進一步的陷入不景氣的泥沼中。而向外借貸，實際上，只要是合理的舉借和有效地利用外資，的確有助於國家的經濟穩定和發展。外資不但可緩解國內資金困難和增長的限制，還可促進或帶動其他資源更充分地加以利用，從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sup>1</sup>但顯然俄羅斯與阿根廷所得到的貸款並未流入經濟結構中生產投資的管道，而是被不當的利用，導致最後國家財政負擔沉重不堪負荷。過重的外債相對增加了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對轉型國家經濟政策設計與執行的影響力，而破壞了權力三角應有的均衡，動搖了經濟政策的穩定性。

在葉爾欽的主導下，俄羅斯自 1992 年開始顛簸崎嶇的經濟改革，到了 1998 年國內的經濟終於在無法招架外來的衝擊下，引發了嚴重的金融風暴。而阿根廷也在阿芳辛、美能與德拉魯阿漫長的經濟

---

<sup>1</sup> 朱曉中，「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的外債問題」，*東歐中亞研究* 4 (1997): 48。

改革下，於 2001 年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從兩國的經濟危機來看，引爆點都是由外而來的，俄羅斯是受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波及，而阿根廷則是受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1998 年俄羅斯信貸危機和 1999 年巴西貨幣危機所導致。金融風暴的發生使投資人因為擔心被波及，所以開始大量的將資金抽離市場。高度依賴外資的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市場，在外資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利率上升的壓力自然就增加，但因為兩國政府背負的債務龐大，使外資懷疑政府的償債能力，所以就算高升的誘人利率也無法吸引外資的回籠。俄羅斯與阿根廷國內經濟體制的缺陷也就一一暴露出來。其次，國內政治環境的不穩定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加溫。另外，國際金融機構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危機一觸即發時停止對兩國的金援，更讓外資感到恐慌。最後，再加上俄羅斯政府與阿根廷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不當，引發了經濟全盤的崩潰。

筆者在研究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穩定化的過程中發現，若國家領導人的經濟改革政策能夠符合國家本身的國情，且得到國會的支持，國內的經濟便可得到較好的表現。此外，適當的外援固然可減輕經改所帶來的陣痛，但國際金融組織的經改藥方對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而言並非良方。一味地依賴外援只會加重國內財政負擔，使經濟轉型的過程倍加艱辛。金融風暴後的俄羅斯，在普欽的帶領下，已逐漸摸索出屬於自己的經濟改革道路，而國內的經濟也漸漸恢復成長與穩定。而阿根廷在歷經 2001 年的經濟危機後，也回歸到反映市場的自由浮動的匯率，今日的阿根廷在新的總統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的領導下，是否有辦法找到適合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模式，帶領國家的經濟走向復甦與成長，還有待時間的考驗。